

汉末三国之际瘟疫探略

秦妍

(陕西师范大学 历史文化学院 陕西 西安 710119)

摘要: 东汉末期至三国末期出现的瘟疫,有暴发频率高、疫区分布范围广、季节性明显等特点。气候变化、自然灾害、人口流动、频繁战争是影响瘟疫暴发和流行的主要因素。瘟疫导致汉末三国之际人口锐减,对战争进程和结局以及建安文学都产生了较大影响,为道教发展提供了一定机会,对医学的发展也起到了某种程度的促进作用。

关键词: 东汉; 三国; 瘟疫

中图分类号: K236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2095-4476(2019)12-0005-08

汉末三国之际(公元2—3世纪)是中国历史上极为动荡不安的时代之一,引起社会动荡的因素有很多,不一而足。除了众所周知的连年混战之外,大疫频发也是一个不可忽视的因素。汉末三国之际的疫情断断续续持续了近两个世纪之久,给当时的人口、军事、文化和信仰等多方面都带来了难以估量的影响。

关于“疫”的含义,古代和现代的解释可能并不完全一致。“疫”,史籍中又常称作“疫气”“疠”和“疫疠”等等,我们一般习惯性称之为瘟疫。瘟疫在现代医学中属于传染病范畴,其定义为:由各种病原体引起的,能在人与人、动物与动物、或人或动物之间相互传播的一类疾病^{[1]166}。古人当然不可能从微生物这个层面出发来解释“疫”,他们只能从“疫”的外在表现出发,来对其进行非常表面化的、粗略的描述。《说文解字》将“疫”解释为“民皆疾也”^{[2]248},即不分老少强弱皆患病,这体现了“疫”具有流行性的特点。魏文帝黄初四年(223年),曹魏大军围攻吴国江陵城,胜利在望之际皇帝却突然要求撤军,究其原因则是“贼中疠气疾病,夹江涂地,恐相染污”^{[3]83},可见“疠气”具有传染性的特点。尽管古籍中的“疫”和现代医学中的“瘟疫”(传染病)在具体内涵上可能存在一些差异,但基于其基本特点相同,故在下文中,笔者将史书中记载的“疫气”“疠”和“疫疠”等,统一称为“瘟疫”。

一、瘟疫流行概况及特点

汉末三国时期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疫病的高发期,西汉汉高祖元年至孺子婴居摄三年(前206—8年)215年间,共发生瘟疫10次,平均21.5年一次;王莽始建国元年至安帝元初五年(9—118年)110年间,共发生瘟疫7次,平均15.7年发生一次^{[4]371-427}。自东汉建国以来每隔几年或十几年就有大疫出现,尤其是自安帝以降,瘟疫暴发频率显著增加,疫区分布范围也更加广泛。因此,本文选取安帝至三国末这一时段的疫情进行探讨。根据文献记载,将历次瘟疫发生情况统计如下表:

表1 汉末三国疫情表

公历	年号	疫情	出处
119年	安帝元初六年	夏四月,会稽大疫	《后汉书·孝安帝纪》
124年	安帝延光三年	九月,京师大疫	《后汉书·顺冲质帝纪》
125年	安帝延光四年	十二月,京都大疫	《后汉书·顺帝纪》
126年	顺帝永建元年	冬十月……甲辰,诏以疫疠水潦,令人半输今年田租	《后汉书·顺帝纪》
129年	顺帝永建四年	六州大蝗,疫气流行 永建中,京师大疫…其后岁岁有病,人情愁怖	《后汉书·杨厚传》 《全后汉文》卷36《应劭(四)》

收稿日期:2019-06-04; 修订日期:2019-06-19

作者简介:秦妍(1993—),女,陕西咸阳人,陕西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硕士研究生。

续表1

公历	年号	疫情	出处
149年	桓帝建和三年	十一月,诏曰“今京师廝舍,死者相枕,郡县阡陌,处处有之…又徒在作部,疾病致医药,死亡厚埋藏”	《后汉书·桓帝纪》
151年	桓帝元嘉元年	正月,京师大疫。二月,九江、庐江又疫	《后汉书·五行志》
161年	桓帝延熹四年	正月,大疫	《后汉书·桓帝纪》
162年	桓帝延熹五年	(三月)皇甫规讨陇右,军中大疫,死者十有三四	《后汉书·皇甫规传》
166年	桓帝延熹九年	春正月…己酉,诏曰“比岁不登,民多饥穷,又有水旱疾疫之困。”	《后汉书·桓帝纪》
169年	灵帝建宁二年	疫气流行,死者极众	《备急千金要方》
171年	灵帝建宁四年	三月,大疫,使中谒者巡行致医药	《后汉书·灵帝纪》。
173年	灵帝熹平二年	正月,大疫,使使者巡行,致医药	《后汉书·灵帝纪》
179年	灵帝光和二年	春,大疫,使常侍、中谒者巡行致医药	《后汉书·灵帝纪》
182年	灵帝光和五年	二月,大疫	《后汉书·灵帝纪》
185年	灵帝中平二年	春正月,大疫	《后汉书·灵帝纪》
196年	献帝建安元年	余宗族素多,向余二百。建安纪年以来,犹未十稔,其死亡者,三分有二,伤寒时居其七	《伤寒论》
208年	献帝建安十三年	十二月,公至赤壁,与备战不利,于是大疫,吏士多死者	《三国志·魏书·武帝纪》
211年	献帝建安十六年	(廋累)随徙民诣邲,遭疾疫,丧其妇	《三国志·魏书·胡昭传》注引《魏略》
215年	献帝建安二十年	从攻合肥,会疫疾	《三国志·吴志·甘宁传》
217年	献帝建安二十二年	是岁大疫 (春)(司马朗)与夏侯惇、臧霸等征吴,到居巢,军士大疫。朗躬巡视致医药,遇疾卒,时年四十七	《后汉书·献帝纪》 《三国志·魏书·司马朗传》
219年	献帝建安二十四年	是岁大疫,尽除荆州民租税	《三国志·吴志·孙权传》
220年	献帝建安二十五年	(曹操崩时,正月)士民颇苦劳役,又有疾病,于是军中骚动	《三国志·魏书·贾逵传》注引《魏略》
223年	魏文帝黄初四年	会大疫,诏敕尚引诸军还 (三月)是月大疫	《三国志·魏书·夏侯尚传》 《三国志·魏书·文帝纪》
223年	魏文帝黄初四年	三月,宛许大疫,死者万数	《宋书·五行志》
234年	魏明帝青龙二年	四月,大疫	《三国志·魏志·明帝纪》
235年	魏明帝青龙三年	正月,京都大疫	同上
242年	吴大帝赤乌五年	秋七月,以兵三万讨珠崖儋耳,是岁大疫,军行经岁,士众疾疫,死者十有八九	《三国志·吴书》 《三国志·吴书·全琮传》
252年	吴孙亮建兴二年	四月,围新城,大疫,兵卒死者太半	《三国志·吴书·孙亮传》
273年	泰始九年 (吴孙皓凤皇二年)	吴疫,三年内京都死者竟达十万	《宋书·五行志》
274年	晋武帝泰始十年 (吴孙皓凤皇三年)	(晋)大疫,吴土亦同 (吴)自改年及是岁,连大疫	《宋书·五行志》 《三国志·吴书》
275年	晋武帝咸宁元年 (吴孙皓天玺元年)	十一月,大疫,京都死者十万人	同上

据上表分析,东汉末期至三国末期的瘟疫具有以下特点:

(一) 瘟疫暴发频率高

东汉安帝至三国末期这150多间,有32个年份都有疫情出现,平均不到5年出现一次。其中又以安帝时期(约2.5年1次)、灵帝时期(约2.6年1次)、建安末期(2年1次)、曹魏初期(1年1次)和孙吴后期(1年1次)的瘟疫暴发最为频繁。

(二) 疫区分布范围广

瘟疫的出现区域极为广泛,从黄河中下游的洛阳(东汉京师、魏京都)、南阳、宛、许等中原地区,到长江

中下游的荆州、九江、庐江、合肥,再到长江以南的建业(吴京都)、会稽,甚至远在西北的陇右地区都先后有疫情发生。文献中对于京师的瘟疫发生记载颇多,而对郡国和州县的瘟疫的记载则少了很多。笔者推测出现这种情况的可能性有两种:第一,京师人口稠密,病原体易于传播,染疫几率大,染疫者众多,疫情确实严重;第二,京城作为首善之区,瞩目度极高,一旦有事件发生,很容易引起关注。与此相反,由于距离和时间的限制,地方上(尤其是较为偏远地区)发生的事件,则一般不易引起关注。由于地方上的受关注度远不及首都所在地,出现这种记载上的失衡,也就比较容易讲得通了。

史料的阙如致使我们无法掌握历次瘟疫的具体情况,但是“大疫”之“大”,这一明显带有程度性的修饰词,似乎可以推测“大疫”应是指疫情较严重或很严重的瘟疫,一般可能是疫区范围广、发病快、传染率或致死率高的疫病。

(三) 暴发季节性明显

这一时期瘟疫的发生具有季节性的特点。将表 1 中的疫情发生时间统计如下表:

表 2 疫情发生时间分布表

疫情发生季节	春 夏				秋 冬		不详
疫情发生月份	正月	二月	三月	四月	秋	冬	不详
疫情发生次数	9	3	3	3	2	5	7
合计	18				7		7

可以看出,这一时期共发生瘟疫 32 次,其中有 7 次发生时间缺乏记载,其余有记载的 25 次瘟疫中,春夏两季是瘟疫的高发期,发生频率高达 18 次,尤以正月为甚;秋冬两季共发生瘟疫 7 次,其发生频率明显低于春季。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可能有二:其一,春季是多种疾病的高发季节。由于天气多变,时寒时暖,尤其是在北方,人们经历了寒冷的冬天,当天气由寒转暖,身体的内环境不能与外界环境立刻适应,机体的免疫屏障较为薄弱,细菌和病毒之类的致病微生物很容易侵入人体,从而引发疾病。就现代社会来说,春季也是一个传染病的高发季,诸如流行性感冒、麻疹、水痘、腮腺炎、流行性脑脊髓膜炎和手足口病等各种各样的传染病都多发于春季。现代医学已能很好地应付大部分的流行性传染病,不致给人们带来较严重的危害,但是在医学水平低下的古代社会,一些在今天看来微不足道的小病也可能会给当时的社会造成极大的破坏。其二,可能跟某些作为传染源或传染媒介生物的生活习性有关。比如有些动物在冬天进入冬眠状态,病原体就在其体内慢慢繁殖,一到春季这些潜伏的病原体活动能力增强,活动范围扩大,在与人类的接触中可能会带去某些传染病。

二、影响瘟疫暴发和流行的因素

作为这场大疫的见证者曹植,曾作《说疫气》一文,描述了建安年间疫情暴发时的社会状况,并对疫情发生的原因提出了自己的看法。文中说“建安二十二年,疫疾流行,家家有僵尸之痛,室室有号泣之哀。或阖门而殪,或覆族而丧。或以为疫者鬼神所作,夫罹此者,悉被褐茹藿之子,荆室蓬户之人耳。若夫殿处鼎食之家,重貂累蓐之门,若是者,鲜焉。此乃阴阳失位,寒暑错时,是故生疫,而愚民悬符厌之,亦可笑也。”他发现“被褐茹藿,荆室蓬户”的穷苦之家,死亡率很高;而“殿处鼎食,重貂累蓐”的富贵之家,死亡率则相对较低。另外还认为“阴阳失位,寒暑错时”的异常气候也是造成瘟疫横行的主要原因。事实上,大疫的发生不止与以上两种因素相关,还受到其他因素的影响,是多种因素交织在一起,共同作用所造成的结果。

(一) 气候变化

气候对瘟疫的暴发和流行可以产生直接、持久且广泛的影响,气候的变动可能为病原体的滋生和繁殖创造适宜的条件。据竺可桢先生的研究,东汉初期,气候开始出现转寒的迹象,但这只是短期的降温,东汉中期时,气候尚且温暖,三国时代,气候才开始不断趋于寒冷,到 3 世纪后半叶气候真正变冷,特别是公元 280—289 年的十年间寒冷达到顶点^[5]。桓帝延熹年间“阴阳易位,当暖反寒,春常凄风,夏降霜雪”^{[6]631};灵帝光和六年冬“北海、东莱、琅邪井中冰厚尺余”;献帝初平四年六月“寒风如冬时”^{[6]3313},魏文帝黄初六年“是岁大寒,水道冰,舟不得入江”^{[3]85},吴太平二年(257 年)二月“雪大寒”^{[3]1153},此外诸如雪、霜、雪、严寒等极端天气的记载在史籍中也不绝如缕。寒冷状况下,由于冰盖的不稳定性,气候突变的可能性会增大^[7],而剧烈的气候变动,极端的气候现象,可以直接或间接的影响到病原体的产生、传播媒介的活跃性,以及人群

的易感性,为瘟疫的发生和扩散营造出适宜的环境。

气候也能通过影响农业来间接影响瘟疫。中国古代是一个以农为本的农业社会,农业发展情况与气候状况息息相关。首先,气候失常可能使农时紊乱,不利于农业活动的开展,农作物的播种、生长和收获等各个环节若没有在适宜的时候进行,必然会影响到农作物的生长和收成;其次,气候失常也会对降雨量产生影响,降雨量的过多或过少可能会引发水、旱灾害,进而影响到农作物的产量;最后,气候失常还易引发自然灾害,破坏农业生产。正如建安年间袁术所睹之况,“天旱岁荒,士民冻馁,江、淮间相食殆尽。”^{[6]2442}农业生产的破坏、农作物的歉收会造成百姓饥馑,而大疫往往伴随或尾随饥馑而至。

(二) 自然灾害

自然灾害会加剧原有的疫情。汉末三国之际,水灾、旱灾和蝗灾等自然灾害频频发生,严重破坏了农业生产,引发大规模的饥荒,多地出现“人多饿死”“饥民相食”的人间惨剧。根据《中国历代天灾人祸表》^{[8]105-168},从安帝永初元年至献帝建安末,共发生水灾34次,旱灾35次,蝗灾19次,其他自然灾害更是不胜枚举。水、旱灾害对农业和农作物的危害自不必说,蝗灾对农作物的危害也不容小觑。古代文献中记载的蝗灾多由东亚飞蝗引起,当其群集迁飞时,往往遮天蔽野,所过之处禾稼草木皆尽。群居型的飞蝗活动力极强,可在空中持续迁飞1-3天,飞行距离长,覆盖地区广,因此一旦发生蝗灾,往往会破坏数州,甚至数十州的作物和植被。俗语云“春播夏耕,秋收冬藏”,据陆人骥《中国历代蝗灾的初步研究》^[9],蝗灾多发于夏秋两季,而东汉蝗灾的发生尤以夏季为多。夏秋两季是农作物生长、成熟的重要时期,此时遭遇蝗灾,大片农作物被啃食殆尽,严重摧毁农业生产。易旱易涝的环境特别适宜蝗虫产卵和繁殖,而水旱灾害恰好能给蝗虫营造出这种生育环境,因此,旱灾是诱发蝗灾的主要因素。水灾、旱灾和蝗灾等自然灾害接踵而至,引起大规模的饥荒,造成民皆饿死、饿殍载道的惨状。

饥荒和瘟疫就如同孪生兄弟,常常相伴相随。一方面,饥荒可能促使传染源的产生。当人们由于缺少粮食而处于极度饥饿时,为了生存会改变饮食结构和食物链,譬如捕食野生动物或食用自死动物都是可能发生的情况,而这些动物身上极有可能潜藏着对人类具有巨大杀伤力的致病病原体。事实上,人类的传染病大都来自于自然界的动物,远者如鼠疫,近者如严重急性呼吸综合征(SARS)、禽流感、埃博拉病毒等,这些自然疫源性疾病的病原体最初只寄生于动物身上,引起动物的发病或不发病,偶然情况下,经过某些渠道转移到人类身上,人类对这类疾病缺乏特异性免疫力,一旦扎根人体,短期内难以控制,就会造成传染病的暴发流行^[10]。

另一方面,饥荒可以创造出有利于病原体产生和传播的条件。当人身体健康时,体内的微生物群落与宿主之间,以及各微生物群落之间会处于一种动态的平衡状态。饥饿造成的营养不良会导致机体免疫功能下降,进而打破这种平衡状态,机体获得“机会性感染”的几率增加,机体患病的风险也随之增加(引起机会性感染的原因有三种:微生物的异位寄生、微生物群落失调和机体抵抗力下降。异位寄生和微生物群落失调均应广义地被包括在机体抵抗力下降中。因为微生物只有突破机体屏障结构才能到达异位寄生部位,故异位寄生应广义地被看成机体抵抗力下降的结果。微生物群落之间的平衡更是机体非特异性免疫功能之一,菌群失调当然意味着机体抵抗力受到破坏,而造成机体抵抗力下降的原因之一就是营养不良)^[11]。汉末三国之际多次发生大范围的饥荒,人类长时间处于吃不饱饭,甚至无饭可吃的状况下,营养不良的必然的,而营养不良势必影响到人体内环境的动态平衡,导致共生微生物由原来的非致病性微生物转化成致病性的病原体,进而对宿主的身体健康造成威胁。

(三) 人口因素

人口因素可以影响瘟疫的传播,加剧瘟疫的流行程度。人口因素对瘟疫的影响,主要包括人口密度、人口流动和人口素质。首先,稠密的人口是维系瘟疫传播的必要条件。传染病的传播必须具备三个基本环节^{[1]168}:传染源(能排出病原体的人或动物)、传播途径(空气、飞沫、粪口、接触传染等)和易感人群,三者缺一不可。人口密集的地方,潜在的易感者更多,病原也更容易生存和转移。据表1的统计,在东汉、魏国和吴国的京师所在地区、以及南阳、荆州和会稽这样的中心城市,瘟疫造访的频率更高,造成的后果也更严重。一个地区的中心城市往往都是人口移动的目的地,大量人口汇集于此,一旦有人受到感染,如此规模的人口足以维持其传染链,因此大城市易于成为瘟疫流行的基地。

其次,人口流动是加速瘟疫传播的主要原因。人口流动会产生新的传染关系,流动人口越多,流动越频

繁, 流动区域越广, 接触机会越多, 则瘟疫传播的更快更广, 疫情就越严重。汉末三国之际正是历史上人口流动的高峰期, 为了躲避战乱或饥荒, 大量生活无着的百姓四处奔波, 食物、用水、卫生等都得不到保障, 身体素质下降, 染疫风险增加。随着染疫者的流动, 瘟疫的传染空间也在不断拓展。这些染疫者到达新的地方时, 又会把病原带给当地的人民, 一旦在没有相关病史的地方传播开来, 其造成的后果往往触目惊心。

最后, 人口的生理素质是影响患疫的重要因素。并非任何接触疫者的人都会患疫, 患疫与否和各人的身体抵抗力密切相关。瘟疫的暴发并不会使接触者 100% 的发病, 有抵抗力者, 即使对致病菌也不会致病, 而没有抵抗力或者抵抗力弱者, 则很容易受到致死性的感染^[10]。汉末三国之际, 战乱四起, 灾害不断, 人民缺粮乏食, 食不果腹, 生活在这种环境下的人们很容易营养不良, 导致自身生理防御能力变弱, 病原易于乘机而入。正如曹植《说疫气》中所观察到的现象, “被褐茹藿, 荆室蓬户”的穷苦之家, 死亡率很高; 而“殿处鼎食, 重貂累褥”的富贵之家, 死亡率则相对较低。穷苦之人更易感染瘟疫, 因为他们生活条件贫乏, 甚至基本的温饱都难以保障, 从而导致体质虚弱, 中医经典《灵枢·百病始生》篇记载岐伯之语, 云“风雨寒热, 不得虚邪, 不能独伤人, 卒然逢疾风暴雨而不病者, 盖无虚, 故邪不能独伤人, 此必因虚邪之风, 与其身形, 两虚相得, 乃客其形。”认为人之所以会患病, 除了受到风雨寒热等自然因素的影响外, 体质因素的影响作用更大。同样遭逢疾风暴雨, 有的人会染病, 而有的人却无恙, 这是因为“病者”本身就体质虚弱, 再加上外界的邪气(病原)入侵, 身体的抗病能力低下, 轻易就受到感染; 而“不病者”体质强健, 外界的邪气(病原)无法入侵, 就难以受到感染。

(四) 频繁战争的影响

三国是一个战火纷飞的时代, 纵观三国九十年的历史, 大大小小战役数不胜数, 仅参战兵力在五万及以上的大型战役就有 92 次之多, 平均一年一场大战。中小型战役的频繁, 那就更无需多言^[12]。战争常与瘟疫相伴, 军队是瘟疫偏爱的场所。表 1 中, 有 7 次瘟疫就发生于军队之中。长途奔袭、急速行军本来就容易扰乱身体内环境的平衡, 军营生活环境往往又比较恶劣, 再加上行军途中饮用水和食物安全得不到保障等诸多原因, 往往更容易诱发瘟疫。此外, 军营也是一个人口密度较大的场所, 如此众多的青壮年可供病原寄生, 大大增加了瘟疫交互传染的几率, 保证了瘟疫的传播链不会中断, 并推动其传播进程不断发展。

战争使得政府的社会救济功能难以有效运行。汉灵帝之前, 社会较稳定, 发生疫情时, 常令使者巡行疫区, 施送医药, 救治疫民。尽管在医治效果可能差强人意, 但是在一定程度上可以缓和疫情恶化, 有时候“最基本的护理也会极大地减少死亡率, 比如, 只需提供食物和水, 就可以让那些暂时虚弱的无法照顾自己的人康复, 而不是悲惨的死去。”^[13]⁷³ 灵帝之后, 群雄逐鹿, 政府的各项体制被破坏, 国家机器几陷于瘫痪状态, 对百姓的死活置之不理, 致使疫情不断加剧。

丧生战乱的大量尸体难以得到正确处理。东汉末年, 兵戈屡兴, 曹操曾令曰“自顷已来, 军数征行, 或遇疫气, 吏士死亡不归”^[3]³², 大量的士兵和百姓丧生于战火之中。曹操《蒿里行》中描写当时混战过后的惨状“白骨露于野, 千里无鸡鸣。生民百遗一, 念之绝人肠。”^[14]⁶⁰⁶ 王粲在《七哀诗》中也有“出门无所见, 白骨蔽平原”^[15]¹⁰⁸⁷ 的描述, 战乱过后, 积尸蔽野, 无人处理, 都已变为森森白骨, 这些尸体可能会污染空气、水源和环境等, 有利于瘟疫的散播。因此, 战争不但是滋生和培育瘟疫的温床, 也是瘟疫传播的助推器。

三、瘟疫带来的影响

(一) 导致汉末三国之际人口锐减

瘟疫具有的巨大的、无差别的杀伤力导致大量人口死于非命。东汉安帝延光四年(125年)冬, 京都发生大疫, 张衡上书说“臣窃见京师为害兼所及民多病死, 上并猥死有灭户, 人人恐惧。”^[5]³³⁵⁰ 又桓帝延熹五年(162年)皇甫规讨陇右, “军中大疫, 死者十有三四。”^[5]²¹³³ 汉献帝建安年间(196—219年)多次发生大疫, 张仲景在《伤寒论》自序中提到此次瘟疫说“余宗族素多, 向余二百。建安纪年以来, 犹未十稔, 其死亡者, 三分有二, 伤寒时居其七。”^[16]³ 曹植《说疫气》描述建安二十二年瘟疫发生时的惨状“家家有僵尸之痛, 室室有号泣之哀, 或阖门而殪, 或覆族而丧。”^[17] 魏文帝黄初四年“宛许大疫, 死者万数”。吴赤乌五年, 孙权派兵讨海南岛, 暴发大疫, “土众疾疫, 死者十有八九”。建兴二年, 吴兵包围魏新城“大疫, 兵卒死者太半”。由于文献资料的简略, 我们无法得知历次大疫造成的死亡数和死亡率, 但通过现有记载, 疫病造成的人口死亡率从“十有三四”到“太半”, 甚至高达“十有八九”, 虽然这些数字可能和实际存在一些偏差, 但“大疫”造成大

规模的人口减损,这点是毋庸置疑的。根据葛剑雄先生的研究,在东汉顺帝永和五年(140年)前后,人口数量达到一个峰值,可能已经超过6000万^{[16]424};三国末期(280年吴亡),在原东汉疆域内,人口数最多时仅为3000万^{[18]447},这140年间人口数下降了约50%。人口数大量损耗的这140年间,恰好和瘟疫频发的时间相吻合,由此可见,瘟疫是导致当时人口锐减的重要原因之一。

(二)对战争进程和结局的影响

瘟疫会影响战争的进程和结果。首先,瘟疫可以影响战争的胜败。建安十三年,曹魏和孙吴之间爆发了历史上有名的赤壁战争,曹军败归,损失惨重。通常认为曹军赤壁之败主要原因有三:第一,曹军远来疲敝,遽然交战,缺乏休整和适应环境的过程;第二,曹军多为北方之人,不习水战;第三,荆州新附之兵,不能尽心于曹军。然而,除以上三个因素之外,还有一个不可忽视的因素——瘟疫。据《三国志·魏书》载(建安十三年十二月)公至赤壁,与备战不利,于是大疫,吏士多死者,乃引军还,备遂有荆州。^{[3]31}又《三国志·蜀书》载“与曹公战于赤壁,大破之,焚其舟船。先主与吴军水陆并进,追到南郡,时又疾疫,北军多死,曹公引归”^{[3]878},《三国志·吴书》也有类似记载云“遇于赤壁,大破曹公军。公烧其余船引退,士卒饥疫,死者大半。备、瑜等复追至南郡,曹公遂北还。”^{[3]1118}由此可见,瘟疫和饥饿也是曹军战败的重要因素之一。裴松之也曾云“至于赤壁之败,盖有运数。实由疾疫大兴,以损凌厉之锋……天实为之,岂人事哉?”^{[3]330}曹军士卒多身染疾疫,极大程度上损耗了士卒的精力与体力,也削弱了曹军的战斗力,疲病之卒遭遇吴蜀之精兵强将,只能不战自溃。

其次,瘟疫可以影响战争的进程,甚至促使战争结束。黄初三年,魏文帝遣夏侯尚与曹真等包围江陵城,江陵城中外断绝,城中兵又多肿病,堪战者仅五千人,江陵城危在旦夕。吴王孙权派诸葛瑾前去解江陵之围,夏侯尚与其他各路大军对吴军水陆夹攻,击退诸葛瑾所部援军。正当魏军以为江陵城指日可拔之时,“会大疫,诏敕尚引诸军还。”^{[3]294}不久,魏文帝发诏书曰:“……(江陵)城中外雀鼠不得出入,此几上肉耳。而贼中疠气疾病,夹江涂地,恐相染污。……今开江陵之围,以缓成死之禽”^{[3]83},江陵城中暴发严重的瘟疫,为避免受到传染,魏军不得已放弃了即将到手的胜利,提前结束了战争。无独有偶,建兴二年,诸葛恪率兵伐魏“夏四月,围新城,大疫,兵卒死者大半。秋八月,恪引军还。”^{[3]1153}不同于前者的是,这次是由于吴军一方士卒患疫,死伤大半,战斗力严重损伤,不得不立即终止战争。

(三)对建安文学的影响

东汉末年在文坛享有盛誉的莫过于“建安七子”,“建安七子”除了孔融被杀、阮瑀早逝外,其余“五子”——即王粲、徐干、陈琳、应瑒、刘桢,都于建安二十二年逝世。据《三国志·王粲传》记载,建安二十一年,王粲随魏军征吴,二十二年春“道病卒,时年四十一”^{[3]599}。又据《三国志·司马朗传》,建安二十二年春,司马朗“与夏侯惇、臧霸等征吴。到居巢,军士大疫,朗躬巡视,致医药。遇疾卒,时年四十七。”^{[3]468}同样是建安二十二年春,同样是随军征吴时,此时军中瘟疫流行,司马朗因感染瘟疫而亡,而王粲此时应该也在军中,极可能同因染疫而亡。王粲之外,其他“四子”也都因感染疫病,于同一年中相继逝世。曹丕在《与吴质书》中云“昔年疾疫,亲故多离其灾,徐陈应刘,一时俱逝,痛何可言邪!”^{[3]608}建安文学中以“三曹”父子与“建安七子”为中坚,因此建安七子的遽然离逝对当时的邺下文人集团和建安文学的影响不可谓不大。

首先,这场瘟疫造成的“五子”的一时俱逝,使流行于当时的以风月、游宴、恩荣、赠答为主要内容的交际应酬之作开始走向衰落,而以悼亡为主要内容的哀悼之文逐渐兴起。前期有如刘桢写给徐干的《赠徐干诗》和徐干回赠刘桢的《答刘桢诗》,王粲、陈琳、应瑒等人的《公宴诗》以及各种表现文采风流的赋等等。而到了建安末期,王粲亡后,曹植作《王仲宣诔》,深切表达了对王粲“早世即冥”的悼念、哀思之情。建安大疫所导致的“亲故多离其灾,徐陈应刘,一时俱逝”的惨况,使得曹丕在痛惜之余,也体会到了生命的无常,促使他思索人生的意义。

其次,这场瘟疫对汉魏之际“诔文”的内容和结构转型也有一定的影响。“诔文”是一种对死者表示哀悼和怀念的文体,先秦两汉时期的诔文注重“述德”——颂扬亡者生前的功德,而魏晋以降的诔文结构和内容都有所转变,先“述德”后“写哀”的模式(前半段承袭传统的述颂功德,后半段则着重彫伤述哀)在此时开始定型。

最后,瘟疫间接地促进了中国古代文学批评的发展和兴盛。曹丕与王朗书中云“‘生有七尺之形,死唯一棺之土,唯立德扬名,可以不朽,其次莫如著篇籍。疫病数起,士人彫落,余独何人,能全其寿?’故论撰所著《典论》、诗赋,盖百余篇,集诸儒于肃城门内,讲论大义,侃侃无倦。”^{[3]88}因这场大疫,使曹丕深切感受到了

人生无常,故而著书立说,以求不朽,其所著《典论·论文》一篇,更是开创了盛极一时的魏晋文学批评之先河,在文学批评史上也是开风气之先之作。

(四) 为道教发展提供了机会

瘟疫的流行为道教发展提供了机会。由于医疗技术、水平和医学认识的局限,古人无法对瘟疫的出现、控制和根除形成科学的认识,也就无法找到正确的解决之道。若不幸染疫,富裕之家尚可访医问药,谋求生路,而贫穷的普通百姓大多无力就医,只能听天由命、坐以待毙。瘟疫不仅使染疫者遭受生理上的痛苦和煎熬,也使笼罩在瘟疫阴霾之下的非疫病者承受着巨大的心理恐慌。对现实的束手无策,导致人们转而寻找非现实的力量,以求获得心理和精神寄托,早期道教便在这种社会背景下应运而生。

汉灵帝中平元年(170年),张角以太平道为号召发动起义,旬日之间,天下响应。根据表1,自灵帝建宁二年(169年)至光和五年(182年)短短13年间,就发生大疫5次,平均约2.5年就暴发一次。连年的瘟疫与太平道的诞生和发展存在着密切的关系:首先,道教以驱邪祛疾作为创教和传教的立足点。张角创立的太平道,“符水咒说以疗病,病者颇愈,百姓信向之。”^{[5]2299}十余年间,信徒达数十万,“自青、徐、幽、冀、荆、扬、兖、豫八州之人,莫不毕应。”^{[5]2299}人们在面对现实无能为力时,往往倾向于求助神秘力量,而道教以符咒治病救人的方法恰好迎合了民众的需求,遂借此大肆收揽信徒,得以不断发展壮大。

其次,太平道的教义能给人民带来心理上的慰藉和寄托。被太平道奉为经典的《太平经》中云“阴气胜阳,下欺上,鬼神邪物大兴,而昼行人道,疾疫不绝,而阳气不通。”^{[19]85}认为瘟疫大兴是由于鬼邪作祟,目的是为了“除凶民,度善人,善人为种民,凶民为混噩”。其终极目的是为了重建天地秩序,在此过程中将会“众妖纵横互起,疫毒冲其上,兵火绕其下,洪水出无定方,凶恶以次沉没。此时十五年中,远至三十年内,岁灾剧,贤圣隐沦。”当地间发生大变动时,神人便会派遣真仙、上士出世来引导、劝厉人民“从者为种民,不从者沉没,沉没成混噩。凶恶皆荡尽。种民上善,十分余一。中下善者,天灭半余,余半滋长日兴”^{[15]5-6}。因此,只有成为“种民”才有可能度过这些灾祸。而且成为“种民”还可以学习长生之术,可以成仙,这对于在瘟疫阴霾下苦苦挣扎的底层百姓来说,无疑具有极大的吸引力,也是他们当时能抓住的一根救命稻草。“道教的神仙理论,宣传神仙不死和神仙可以学致,赋予了在瘟疫带来的恐怖气氛中慨叹生死靡常的天下苍生以摆脱瘟疫厄运的希望和追求生命永恒的信念。”^[20]

此外,这次瘟疫对医学的发展也起到了某种程度的促进作用。张仲景宗族100余人,有三分之二死于瘟疫,这促使他“勤求古训,博采众方”,对伤寒做出了较全面的分析,在此基础上撰成的《伤寒杂病论》,为中医的发展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通过以上论述,我们可以看到:汉末三国之际的气候变化、接连不断的自然灾害、纷繁扰攘的军阀混战,以及严峻的人口问题等都可能成为引发瘟疫的导火索和促使瘟疫传播的助推器。但瘟疫的肆虐,究其主要原因当在于当时的社会发展水平和医疗卫生条件的限制。

汉末三国之际的瘟疫对社会的影响全面而深远。首先,瘟疫对人口的影响是最直观、最明显的,瘟疫导致大量人口的非正常死亡,是东汉末出现人口低谷的重要原因之一。其次,瘟疫在战争中的作用也是不可忽视的,它能以“一己之力”影响战争的进程和走向,甚至决定战争的成败,但由于瘟疫经常以某种“隐身”的状态影响战争,以至于史籍中它的存在和影响常被战争本身所掩盖。再次,瘟疫对文学和文化的影响是以众多生命的逝去为代价的,它间接地激起了人们对生命的思考,无形之中促进了文学的发展。最后瘟疫对社会心态和宗教信仰也产生了重要影响,“这种影响对社会历史的作用虽不像人口死亡、政权更替、经济衰退那样直接和明显,但却是非常深远和重要的”^{[21]299}。因此,我们不仅仅要关注瘟疫本身,更要关注其对人类社会所带来的影响和人类社会对瘟疫的反应。

参考文献:

- [1] 中国大百科全书总编辑委员会. 中国大百科全书: 现代医学[M]. 北京: 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 2002.
- [2] 许慎. 说文解字[M]. 杭州: 浙江古籍出版社, 2016.
- [3] 陈寿. 三国志[M]. 裴松之注. 北京: 中华书局, 1959.
- [4] 陈业新. 灾害与两汉社会研究[M].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4.

(下转第25页)

(上接第 11 页)

- [5] 竺可桢. 中国近五千年来气候变迁的初步研究[J]. 中国科学, 1973(2): 168 - 189.
- [6] 范晔. 后汉书[M]. 李贤注. 北京: 中华书局, 1965.
- [7] CLAUDE LORIEUS, HANS OESCHGER, 汪志革. 古气候预测——减少全球变化中的不确定性[J]. AMBIO - 人类环境杂志, 1994(1): 30 - 36.
- [8] 陈高儒. 中国历代天灾人祸表[M]. 上海: 上海书店出版社, 1986.
- [9] 陆人骥. 中国历代蝗灾的初步研究——开明版《二十五史》中蝗灾记录的分析[J]. 农业考古, 1986(1): 311 - 316, 324.
- [10] 庄振荣. 自然疫源性传染病预防控制相关研究[J]. 口岸卫生控制, 2011(4): 39 - 44.
- [11] 金天如. 试谈条件致病菌中的几个问题[J]. 医学与哲学, 1984(11): 10 - 12.
- [12] 方北辰. 三国名将: 一个历史学家的排行榜[M].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4.
- [13] 麦克尼尔. 瘟疫与人[M]. 北京: 中国环境科学出版社, 2010.
- [14] 沈约. 宋书: 第 2 册[M]. 北京: 中华书局, 1974.
- [15] 萧统. 文选: 第 3 册[M].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6.
- [16] 张仲景. 伤寒论[M]. 郑州: 河南科学技术出版社, 2017.
- [17] 曹植. 曹植集校注[M]. 北京: 人民文学出版社, 1984.
- [18] 葛剑雄. 中国人口史: 第 1 卷[M]. 上海: 复旦大学出版社, 2002.
- [19] 罗焯. 太平经注译: 第 1 卷[M]. 重庆: 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 1996.
- [20] 黄勇. 汉末魏晋时期的瘟疫与道教[J]. 求索, 2004(2): 230 - 232.
- [21] 余新忠. 清代江南的瘟疫与社会[M]. 北京: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4.

(责任编辑: 陈道斌)